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專刊(3)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錯誤傾向

余冠英等著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專刊(3)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錯誤傾向

余冠英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937 字數 182,000 開本 850×1168 耗 $1\frac{1}{32}$ 印張 $8\frac{1}{4}$ 插頁 2

195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4) 0.82 元

序 言

自从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論展开批判以来，我所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志們开始密切注意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其他錯誤傾向的工作列入計劃。这本小书里的12篇文章，或以批判为主，或在学术討論中帶有批判性，都是从我所先秦至宋文学組和元明清文学組部分同志所写的批評文章中选出来的（凡已經編入个人的文集或涉及問題比較小或写得比較一般的文章都沒有收入）。

这里的12篇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文章3篇，批判俞平伯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特别是“红楼梦”研究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其中“俞平伯先生底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唯心論的文艺学术思想”一文，根据俞平伯先生三十余年来的主要著作，分析俞先生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及文艺思想，說明他在学术研究上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是‘微言大义’呢还是穿凿附会”一文，指出俞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許多牵强附会的解釋，并分析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治学方法的錯誤及其危害的严重性。“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义及其它”一文，指出俞先生的趣味主义和他的那种沒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指出这种思想是受了周作人的影响。

第二部分包括文章三篇，批判胡适的买办阶级文学观和文

学史观。其中“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和捏造及其影响”一文，分析胡适捏造和曲解中国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手段和目的，并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传播甚至发展胡适的论点的严重现象。“胡适文学思想批判”一文联系胡适的反动政治立场来批判他的文学思想，同时指出这种文学思想也就是胡适的反动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胡适夸大他个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一文，揭露胡适偷窃清末许多人的意见充作自己的创见，把自己吹捧成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同时批判他的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第三部分的六篇文章针对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其他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其中“读‘中国文学史稿’”一文批评了馮沅君先生和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稿”，除指出其中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以外，并对这部文学史稿的编写方法和分期问题提出意见。“‘中国文学史简编’批判”一文对于同书的改订本提出批评，不但批评了这部书中庸俗社会学倾向，而且指出右派分子陆侃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恶意歪曲。“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庸俗社会学倾向”一文，主要是从元杂剧研究中出现的简单地把文学作品贴上“宫廷”、“民间”的标签，从而加以否定或肯定，以及抹煞文学特性，机械地论述文学作品反映经济现象等问题，着重批判古典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庸俗社会学的方法。^③“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和“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红楼梦之关系”两篇论文都是针对着把红楼梦说成是市民文学的意见提出批评。这种意见的流行也是庸俗社会学倾向的一种表现。“评‘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一文批评了孙楷第先生在短篇白话小说研究中存在着的

主觀唯心主义思想,并指出他所受胡适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文章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未經发表外,其他11篇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文学研究集刊”、“北京大学学报”和“文学遗产”等报刊上登載过。这次編集时有些文章又經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应该說明的是:我所同志虽然在这几年中注意了学术思想的批評工作,但做得还是很不够。为了使今后的工作有所提高,我們期待着讀者对这本集子的批評。

編 者 1958年8月12日

目 录

俞平伯先生底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唯心

- 論的文艺学术思想 力 揚 (1)
- 是“微言大义”呢, 还是穿凿附会? 余冠英 (35)
- 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义及其他 陈友琴 (46)

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

- 其影响 余冠英 (52)
- 胡适文学思想批判 范 宁 (69)
- 批判胡适夸大他个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
作用 曹道衡 (78)

讀“中国文学史稿” 余冠英 (100)

讀“中国文学史簡編”(修訂本)批判 刘世德 (111) 邓紹基

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傾

- 向 邓紹基 (132)
- 評“紅樓夢是市民文学說” 刘世德 (148)
邓紹基

关于黄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

- 及其与“紅樓夢”的关系 曹道衡 (186)
- 評“中国短篇白話小說的发展与艺术上的
特点” 曹道衡 (250)

俞平伯先生底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和 唯心論的文藝學術思想

力 揚

當我們的學術界批判了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唯心論之後，我在此根據他三十年來的著作，試圖比較全面地分析一下他底人生觀和文藝、學術思想的發生和變化，並加以批判，借以揭露他底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历史根源。這樣，我想不僅對於俞先生個人的思想改造，有所裨益；並且對於那些在人生歷程和思想發展上同俞先生走着大致相同道路的人們，在清除他們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時候，也許可以作為借鑒。我們的祖先說過一句很好的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一

毛澤東同志在其天才的劃時代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里，於論證了產生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系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所領導；並劃分了这个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綫為四個历史時期之後；指出以“五四”運動為主要標志的这个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綫的第一个時期的成員和成員的變化是這樣的：“五四運

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們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战綫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① 这里所指的第二个时期，系指这个文化革命的統一战綫的第二个时期，即 1921 年到 1927 年的时期；这里所指的敌人，系指由帝国主义力量和封建力量所結成的反动同盟。

毛澤东同志这一段話，既說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在文化革命的統一战綫的第一个时期，曾經起过一定程度的作用；也說明了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其后向反动方面的变化。俞平伯先生虽然和那些向敌人投降以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有所不同——因为在政治上，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还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不滿，更不曾有过象胡适那样的堕落；在思想上，他也沒有胡适、梁实秋那样严重反动的帝国主义买办思想；但在文化革命的統一战綫上，从“五四”运动的右翼，轉向对敌人的妥协，在这一点上說，他和其他大部分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是并无二致的。

在“五四”运动的思想潮流的影响之下，俞平伯先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詩集“冬夜”。在他的文艺作品中，它是唯一的比較有

^① 引自“毛澤东选集”第 2 卷第 671—672 頁。

若干进步内容的，引起人注意的集子。他在这个集子的“自序”中说：“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并且说：“我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正因为这一点进步性，在这个诗集的若干作品中，他对被损害被压迫的民众抱着微弱的同情；对当时的军阀统治流露了“怨而不怒”的諷喻。但是，在这个集子里，多半却是抒写个人的悲欢离合的，纪叙游踪浪迹的，和一些感叹人生的寂寥和人生如梦幻的篇章。而在一首题名为“不知足的我們”的诗作里，他还赞颂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論学者罗素“是領港的，是引道的”，是“光明的源泉”。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当口；有了发展，有了若干程度的上升，但因为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土上繁育起来的，其先天就带有軟弱性，带有濃重的封建性；而且当时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处于垂死的沒落的境况中，因之也更带有反动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不受到它的这些方面的影响；因此，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当他们为自己底阶级唱着赞歌的时候，就已经唱起了它底輓歌，当他们歌颂着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时候，也就杂拌着虛无的宿命論的唯心論的反动。我們如果把他們和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具有战斗精神和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比較起来看，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我于俞平伯先生的“冬夜”等作品里，看見了这一点，我也于其他中国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里，看見了这一点。

在1921—1927年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领导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而取得了北伐的伟大胜利。这时期的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也随着政治上的革命统

一战线的发展而发展。它底主要任务,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是宣傳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張,反对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話文。

文化革命的統一战线底第三个时期,即1927—1937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因为中国的大資產階級,在上一个时期的末期,已經轉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領導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个时期,是革命深入的时期,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而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領導的文化革命的統一战线上,又有了左翼文艺(当时也被称为普罗文艺的)运动的勃兴。

可是,由于俞平伯先生出身于封建仕宦的家庭;他底思想意識上帶有濃重的封建思想的殘余。他从文化革命的統一战线底第二个时期起,就开始和反动文化相妥協。他在“五四”时代的那一点資產階級的进步性,早被蓬勃的革命潮流所吓退,而懾伏在反动文化的势力之下,并与它和平共居。而对于当时新兴的普罗文艺运动,則抱着譏刺的和抗拒的态度,对于共产主义則存着恐惧心理。1928年1月,他在北京写了一篇“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小記”^①,是記叙一个梦境的。他夢見他在苏州的旧宅,被具有共产化的“会匪”所包圍,他自己則拟仓皇出走。可見当时深入的农村革命,是吓得俞先生底梦魂不定的了。

在俞平伯先生三十多年的著作生涯中,以这两个时期(即1921年—1937年)的作品为最多。这些作品的性質,大致可以

① 見俞著:“杂拌儿”。

分为三类：一类是怀恋“堕欢旧梦”的和感叹人生的散文和小诗，在这些作品里表露了没落阶级的人生观。又一类是谈说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论文和替别人的著作所作的“序”、“跋”。第三类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文物的研究、考证。这类著作，对某些细小的问题，虽有可取的成績，而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则是唯心主义的，从而那些细小的成績就被重大的謬誤所淹沒，“紅樓夢研究”的前身“紅樓夢辨”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俞先生既远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現實，又远离了文化革命的現實，于是他的精神生活，就不可能不倒退在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上面去，沉緬于个人的細小趣味上面去。俞先生从这个时期起，所写的作品，除小诗和若干散文，还用半文半白的文体外，若干散文和研究考证的文章，大多数采用了文言文，特别接近于明末小品文的风格。朱自清先生在俞著“燕知草”的序文里，有这么一段話，对于我們了解当时俞先生的思想、趣味，是頗有帮助的。朱序上說：

近来有人和我談起平伯，說他的性情行徑，有些象明朝人。我知道所謂“明朝人”，是指明末張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慚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現在流行的話，大約可以說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們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滿不在乎的。他們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脫”的气息。平伯究竟象这班明朝人不象，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給他說明，你看“梦游”①的跋里，岂不是說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象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間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鉄証。标点“陶庵梦忆”②，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張岱的向往，可为旁証。而周昌

① 俞平伯所作散文，見“燕知草”。

② 明人張岱所作小品文集。

明先生“杂拌几序”里，将现代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但我知道平伯并不会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习性有些相近，便尔闇合罢了。

俞先生的性情行径，既然相近于明朝人，所以俞先生有些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也就相近于明朝人了。一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者，因为自己的作品象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的明朝人，反而沾沾自喜起来，这除了说明俞先生十分向往封建时代那些所谓风流名士的生活方式，并甘心和封建文化相妥协，甘心颂扬封建文化之外，还能够说明别的什么呢？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是俞先生严重地脱离广大的社会现实生活以个人趣味为主的许多作品中，一篇最典型的作品。作品所叙说的，是鸟的故事。俞先生和他的夫人紫养了两只小鸟。他们叫那只雌的为稚翠，叫她的情人为知恋。一天，鸟笼从竹竿上滑了下来，稚翠跌伤了，以后又死了。然而，这些都还是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是俞先生自己所写的，如下的一些事情：

……某年月日，我们几个人在北边花园里举行稚翠的葬仪和祭典。

以小小的盒儿盛着，外罩以洋铁罐，浅浅地刨个坑，我们把她埋在池边桂树之下，立一小小的短碣，碑为之，中镌“稚翠墓”三字，旁列年月日，填以丹朱。又以知恋为主人，大家来祭。我做了一篇骈四俤六的祭文，其文久佚，虽不见佳，想来亦可惜，只记得在叙她的病况有“既遭折足之凶，又抱风寒之疾；”在叙葬仪里有“即日葬于浅碧池头，芳桂树下，礼也。”以外祭奠的礼单，在L处有一张，有焚香、读祭文、三奠爵、焚遗物、洒酒等等节目。

这文写作的时间是1928年，是俞先生来北京后追記寓居杭州时的故事的。他来北京后，还怕“稚翠墓”遭陵谷滄桑之变，函托在上海的朋友，因游西湖之便，去探望一番。

这不禁使我想起賈宝玉、林黛玉葬花的故事来。

生长在十八世紀中叶中国封建社会“黑暗王国”里的賈宝玉和林黛玉，他們因痛悼他們自己自由恋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因而把落花看作他們自己底被损伤的理想的象征，带着少男少女的純洁的眼泪，把它們埋葬起来，免受尘世罪恶的污染——这幅充滿詩意的画境，是能够深深地激发讀者对于他們悲剧命运的同情，对于人类美好理想的渴望，对于封建礼教的憎恨的。而俞先生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紀，人类自由解放的坦途，已經伸展到每个人的脚下，却在津津有味地干着那样沒出息的勾当，在他自己是“因为好頑”，在作品的社会效果上說，則是迷惑讀者沉緬于身边瑣事，远离革命斗争，为反动的社会力量服务的，岂仅仅如俞先生自己所說的：“我年来只埋头尘土中，虽非桃源之民，亦久不知时代为何物矣。所以說起来也真惭愧杀人”^①而已。

俞平伯先生在“嚙語”詩輯第二十五，那首写倦鳥的小詩里，充分地流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軟弱无力和无出路的情緒。

倦鳥是不會想到投林的。

“甜蜜的中林，

归去，不如归去。”

豈是倦鳥的情怀呢？

① 見俞著：“杂拌儿之二”中“孤憤序”。

无所归哟，无所归哟，
夜色莽然而独下。

懒洋洋地飞着，
歇哈哈地飞着，
飞得低低的，
渐渐渐渐的飞不动了。
棉花的翅儿，锡糖的眼儿，
“小鸟儿，归于夜罢。”
无所归哟！
夜色莽然而独下。①

生长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度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离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他怎样能够飞得动呢？他怎样能够找得到归宿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这就不能不威胁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极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俞平伯先生对当时违反全国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退让，采取不抵抗政策的，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及其所豢养的奴仆，是深怀不满的。1932年，他在“广亡征”一文中写道：

……（我们）好容易在至圣先师牌位前爬起来，而又在洋大人的膝前跌倒了。我们的前辈无非顽固，而我们这一代实在卑鄙，卑鄙到豎不起脊梁骨的程度，于是有了所谓高等华人。夫高等华人者，自居

① 俞著：“杂拌儿之二”附录。

于卑下而以白种为天驕，歐美为娘家之人們也。以此治国，国胡不亡；以此教士，士胡不糟；群公不休，中国休矣。別的且不說，从九一八至于今日，除掉有点高調以外，举国上下差不多一心一意的在靠外国人：从头不抵抗，一也；錫糖般的泥着国联，二也；秋波瞞着太平洋的对岸，三也；以长期不抵抗为长期抵抗，四也；至恭之礼以事游历团；至不惜自涂其国民革命成績表現之标語，五也；大学教授們向游历团遞上說帖，六也；打电报向美国乞哀，七也；“这样的一个自治省政府，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八也；为北平有了文化的緣故，自己就要賭咒永不駐兵，九也。^①

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譏刺引狼入室的蔣介石卖国政府为“虎狼屯于阶前，燕雀嬉于堂下”。他又說国民党的教育、交通政策，都足以亡国，“中国的交通，不啻为帝国主义导夫先路，它的教育又不啻为买办階級延攬人才。”他主張抵制洋貨；主張中国人学东洋人和西洋人，要学他們“干”的精神，不要学他們的皮毛。

在俞先生的著述中，反映社会重大問題的，原来不多，即偶而接触到一点，也只是用微詞曲笔，出之以幽默。“广亡征”是他敢于大胆地談論国家大事，并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政治見解的一篇文章。在这里，他表达了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的一些主張和愿望；他对国民党反动卖国政权投出了相当尖銳的譏刺；他流露了敌愾同仇的爱国情緒。正因为这些，他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在思想上，特別在政治上，还不曾有过象帝国主义文化买办胡适那样的堕落；在敌伪統治时期，他还保持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碼的气节。也正因为这些，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

① 俞著：“燕郊集”第 91—92 頁。

革命統一戰綫政策和对待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确执行，他才能够于1949年7月1日在先农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紀念会之后，唱出了这样的歌：

.....
.....

这里，充滿着感激的顏色，
振动着和諧雄壯的歌聲，
大幅的紅旗，圓圈招飜，
閃爍的銀燈，斷續照明，
馬、恩、列、斯的巨象，
高標半空，
如偉大的導師們親臨。

.....
.....

都來听听這二十八年奮鬥史罷！
可歌可泣。
怎麼樣從艱危里鍛煉出堅貞，
怎麼樣從苦難里孕育着光明，
我們不久將親眼看到
這中華人民新國的誕生。

.....
.....

我深深体認到群众的庄严的秩序